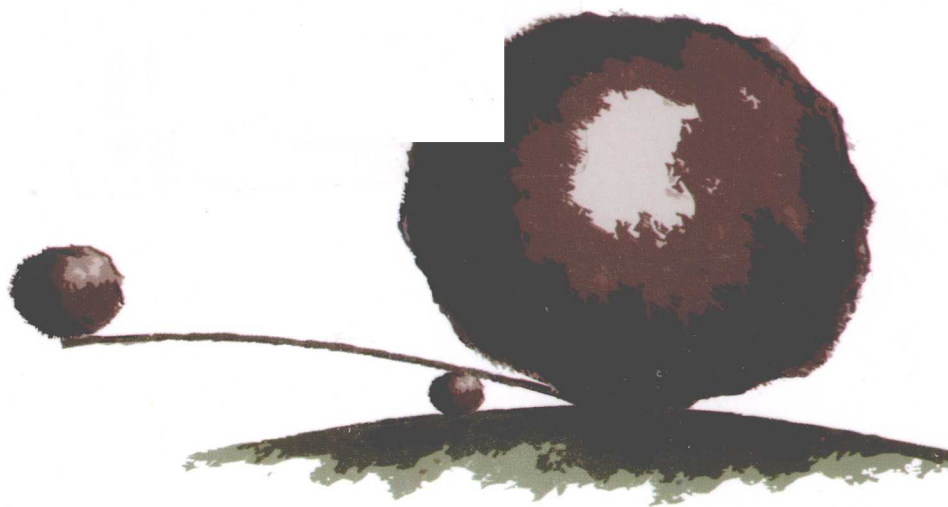


陈宪公开演讲录 陈宪 著

跷跷板上看天下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其他学科一样，
是简单的、易记的……
对于学者们来说，
他们的任务是准确地阐明这些原理，
并用这些原理，
向人们解释大千世界的种种现象。



远东财经

陈宪公开演讲录

陈宪 著

跷跷板上 看天下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跷跷板上看天下：陈宪公开演讲录/陈宪著.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1

ISBN 978 - 7 - 5476 - 0345 - 1

I. ①跷… II. ①陈… III. ①演讲—中国—当代—选
集②经济发展—中国—文集 IV. ①I267②F12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7044 号

责任编辑：程云琦

封面设计：张晶灵

跷跷板上看天下 陈宪公开演讲录

著者：陈 宪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200336

网址：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市印刷二厂

装订：上海张行装订厂

版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 1000 1/16

字数：125 千字

印张：10

印数：1—5100

ISBN 978 - 7 - 5476 - 0345 - 1/F · 436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 - 62347733 - 8555

序

近年来,随着公众文化素养的日益提升,其文化兴趣和需求也不断向学术领域延伸拓展,各类公益性、公共性文化讲坛、理论沙龙、学术演讲便应运而生。这也使许多大众传媒为了博取“眼球效应”,竞相刊登专家学者的演讲录,并受到热捧。

公共演讲或演讲录的行俏走红,并不表明任何学术观点、理论思考都能借助演讲这种形式吸引公众的关注,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一场受欢迎的演讲或一篇得到好评的演讲录,应该搭准听众或读者的思想脉搏,叩击他们的兴奋神经,集传播知识、激荡思想、析事明理、解疑释惑乃至疏导情绪、安抚心灵于一体,营造一般的授课、讲座、报告或学术理论文章所不能比拟的“剧场效果”。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就是演讲者诉求方式的转变,也就是不能端起架子,以布道者自居,“我讲你听”、“我点你通”,而必须充分把握受众的心理,以期在相互照应中达到有效的思想共鸣。过去,说书艺人刘敬亭之所以广受欢迎,就在于懂得掌握听众心理,“稍见下人咕哝耳语,听者欠伸有倦色,辄不言”。学术演讲不同于说书,但在强调传播效果上却是相通的。

在上海学术文化圈里,陈宪教授是不多的几位既在专业领域具有较高学术造诣,又活跃在公共文化领域、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学者之一。他不拘一格,既擅长于捕捉重大现实理论和实践问题,以精准严谨的经济学专业眼光进行全面深刻的分析判断,又勇于社会担当,敏

锐地抓住当下发生或出现的社会事件、社会矛盾、社会现象,及时作出评论。同时,他还受邀到一些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公益性文化讲坛发表演讲,并将这些演讲心得整理成文刊登在各大媒体上,时不时成为一个文化传播亮点。

陈宪的演讲录,一如他的专业论文、理论文章、经济时评、学术随笔,比较全面地融汇了他个人固有的专业背景、知识积累、学术取向、思维方式、治学风格。每一篇演讲录,都反映了他在改革开放和上海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不同阶段所作的敏锐观察和思考。大致说来,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触角新。读陈宪的演讲文章,每次都会有眼睛一亮的感觉,原因就在于他以敏锐的学术触角,始终在关注和思考与现实社会新发展新探索密切相关的紧要问题和公众关心的热门话题,比如上海如何发展现代服务业、政府应该体现怎样的公共服务、民间组织如何培育、公平与效率如何兼顾、教育体制如何改革,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不可回避的公共问题。这也使他的演讲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新意迭出。比如,在《公共政策是用来对问题排序的》演讲中,出人意料地提出“公共政策首先是用来对问题排序的,然后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并引出了公共政策的价值基准点和透明度问题。二是重智慧。陈宪话锋机敏,不喜欢一般地运用经济学原理或抽象的概念解答问题,而是巧妙地运用假设,先是提出问题,然后一一加以剖析,论述中常有智慧的闪耀。再加上清晰的文字表达、恰当的案例引用,这就让人在参与思考的同时,产生渐入佳境、豁然开朗之感。比如,在《跷跷板上看天下——一个经济学者眼中的世界》演讲中,抓住经济生活中常常遇到的两难选择和困惑,诸如公平与效率、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常规发展与创新发展、国际化与本土化等,以小见大、虚实结合,反复考辨。你不一定触摸到生硬的经济学原理,但在明白晓畅的论述后面,却处处蕴涵着深刻的道理。三是专业精。专家学者如何在关注公共领域问题、参与公共问题讨论的同时,又不荒疏专业研究,保持一定的学

术水准,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是知识性、专业性更多,还是公共性更多?读了陈宪的演讲文章,才明白,原来知识性、专业性和公共性之间,不是截然排斥的。陈宪学至博士,接受过系统深厚的经济学熏陶,又长期工作在教学科研一线,知识性、专业性对他而言,是不存在问题的,但他的家庭背景和早年在基层单位工作的草根经历,却使他多了一份社会责任和担当,对现实问题不会视而不见。正是带着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和深沉思考,又促使他更加刻苦地去钻研理论和学术问题,用新的学术思考和理论研究成果去破解现实难题。他看问题往往一针见血、击中肯綮,没有深厚的专业学养是难以为之的。

公共演讲不同于一般学术演讲,也是一种大众文化传播,哪怕涉及专业问题,也需要体现大众化、通俗性。陈宪的许多演讲文章不拘泥于概念推演,而是力求跳出艰涩枯燥的概念堆砌,还原经济学的生活内涵和现实依据。陈宪曾经自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其他学科一样,是简单的、易记的……对于学者们来说,他们的任务是准确地阐明这些原理,并用这些原理,向人们解释大千世界的种种现象。”用专业的眼光发现生活的真谛,用理性的分析升华生活的智慧,这或许是他的演讲录最大特点。

陈宪是我多年的挚友,蒙他不弃,在他的演讲录结集出版之际,嘱我作序,这就使我有机会在诚惶诚恐中带着“任务”先读为快,写下如许文字,算是“导读”。是为序。

周智强

2011年3月早春阳光下

目 录

	序	1
辑一	公共政策是用来对问题排序的	1
	市场自由、政府干预和“中国模式”	3
	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	
	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	13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政府的性质与税制改革	22
	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	
	公共政策是用来对问题排序的	33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市场与组织关系中的民间组织	42
	在“民间组织与和谐社会”研讨会上的演讲	
辑二	服务经济发展与中国的选择	53
	服务业演进的历史与逻辑	55
	在上海外贸学院的演讲	

服务经济发展与中国的选择	64
在 2007 年上海学术年会上的演讲	
服务革命与现代产业发展	73
在《中国服务经济报告 2009》首发式上的演讲	
创业、创新与服务业发展	83
在“东方讲坛”的演讲	
教育体制改革的公共经济学思考	92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文化,下一个要素,下一个产业	102
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	
晓晓板上看天下	115
思想的经济学与科学的经济学	117
在上海大学的演讲	
晓晓板上看天下——一个经济学者眼中的世界	127
在“东方讲坛”的演讲	
全球经济的结构性修复和可持续发展	140
在南通大学的演讲	
后记	150

辑一

公共政策是用来对问题排序的

- 公共政策首先是用来对问题排序的,然后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所谓公共政策在效率与公平的均衡中排序是一个伪问题,公平优先是公共政策排序的不二法则。
- 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调整利益分配,不仅调整增量的利益分配,更要调整存量的利益结构。
- 当城市的 GDP 增长与长期协调发展存在矛盾时,孰为优先? 答案本来是很清楚的,但有些地方政府还是经常搞错。
- 如果说政府对市场失灵是第一次纠正,那么,民间组织就是第二次纠正。

市场自由、政府干预和“中国模式”

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

这场金融危机在引发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刻调整的同时,也促使我们重新认识若干经济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其中,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等问题,再次成为热点问题被提了出来。围绕金融危机的成因和治理,可以发现分析和研究这些问题的新视角。今天我们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背景,并结合美国和中国政府在危机后的作为,对政府干预出现的新综合,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模式”的讨论,做一梳理和阐述。

危机终结了市场自由吗?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不绝于耳。一种颇有市场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是自里根—撒切尔时代以来,美英等国政府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进而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事实上,这一观点不完全能成立。我们可以这样设问:中国和前苏联等一批国家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其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但最终都因效率低下而不得不放弃计划经济,进而向市场经济转轨,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一实践的失误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类似的问题还有,怎样看待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经济学成功的年代,是被称为“黄金时代”的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当时西方国家“混合经济”创造的经济稳定和增长速度是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

此后,经济机制再次出现故障,“繁荣—萧条”周期又开始了。“黄金时代”以“滞胀”结束。“滞胀”是一种通胀上升和失业上升同时并行的现象。人们把这场灾难归罪于凯恩斯革命本身。有人要求,“回到市场自由”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就是在这—背景下卷土重来的。然而,包括凯恩斯本人和以后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凯恩斯经济学是萧条经济学,它说明萧条是怎样发生的,以及提出应对萧条的政策主张。如果越出这个范围,滥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 and 政策主张,导致出现其他什么问题,那是不能把账算在凯恩斯主义身上的。

任何理论都是在—组假设条件下解释某种现象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都概莫能外。我们来看看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假设是什么。它的第一个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即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利用捕捉到的信息,有能力使他的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达到最优。它的第二个假设是完全竞争假设,即各类市场内部都能实现充分竞争,一旦市场出现供求失衡,价格和工资就会迅速作出调整,进而认为,市场机制具有自动调节功能,可以使经济总是在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下运行。

在经济人假设中内含着完全信息假设,也就是说,经济人能够达到最优结果,是以获得“完全信息”为前提的。如果说放松经济人假设还存在较大争议,那么,完全信息假设已被彻底放松,信息不对称是现实经济的常态。市场制度能够使信息自动对称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由此就提出了非市场制度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经常这样解释“制度”:制度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一种合同安排。这些合同安排的重要作用就是使信息对称,或者是当信息不对称存在时,制度规范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行为。

完全竞争假设也同样存在条件过于苛刻的问题,如产品无差别,因此,现实的市场都是不完全竞争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竞争是不充

分的,价格和工资的调整经常是滞后的,经济经常是偏离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的。这就提出了通过政府干预解决非均衡的问题,尤其当非均衡状态比较严重时,一如当下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更是如此。

在一组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新自由主义解释经济现象的主要结论是,自由选择是经济活动最基本的原则。应当自由地拥有私人财产,自由地交易、消费和自由地就业,自由选择的程度越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就越高;市场的自动调节是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充分就业均衡的唯一途径;只要有可能,私人活动都应该取代公共行为,政府不要干预,即使不得不干预,也是越少越好。然而,这些结论是建立在这些假设都成立的条件下的,如果这些假设不成立或需要放松,那么,情形当然要发生变化。由此可见,市场自由在于给出了市场机制和市场运行的基准。基准的作用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它也可以作为目标、标准,或者是经济运行效率的一个参照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并不可能,也不应该终结市场自由。

政府干预出现了“新综合”

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是指当市场不能自动出清时,即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和刺激有效需求,以帮助市场恢复均衡。凯恩斯将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归结为心理因素,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和流动性偏好。因此,政府干预是在增加需求的同时,帮助人们恢复对市场的信心。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政策的不当操作引起的,就像“大萧条”的起因,有研究指出,是货币政策不恰当的收缩,导致“大萧条”的爆发。而且,经验事实告诉我们,后续的政府干预似乎总是对上一轮政府干预的纠错。由此可以部分地反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尽量少的政府

干预是有道理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其他条件的变化是很快的、复杂的,如全球化及全球化逆转的问题,又如社会公正的问题。因此,面对今天的世界,我们要从“新综合”的视角研究政府干预。

首先,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被人们在不经意间做了扩展。扩展就是一种综合。第一个扩展是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运用到有效供给不足时,即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形。我们知道,凯恩斯经济学是为经济衰退、萧条开药方的经济学。然而,后人将凯恩斯的政策主张用到经济繁荣时,进而交替地刺激或抑制需求,使之成为政府干预的两个方向。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中,综合这两个方向的政府干预被称作反周期。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如此的相反操作,是否是可行的、有效的?在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膨胀互相推动的今天,就更是如此。

第二个扩展是指相对于市场自由而言的政府干预,即在市场不能有效定价的地方,实行政府定价。例如,当垄断形成后,垄断厂商就会操纵价格,以谋取超额利润,政府则要通过某种规制决定或影响价格的形成;又如,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或具有非排他性的共有资源,抑或具有非竞争性的自然垄断,都有市场不能定价的问题,政府要么提供没有价格的公共物品,要么如上所述,通过某种规制决定或影响与自然垄断、共有资源有关的价格的形成。这是因为,市场的基本功能就是定价。一旦当一种产品或服务不能由市场定价了,即出现市场失灵,此时,就需要一个外部力量,通常是政府,来帮助市场定价,或者设计一个机制,来恢复市场定价的功能。在屡屡发现政府定价也存在失灵的情况下,人们发现,后者是一个更好的方法。

事实上,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也是通过价格调整起作用的。这里的價格就是利率。通过引入货币市场,利率既定的假设被放松,通过利率的上升或下降,可以调节商品市场的供给与需求,进而影响商品价格的形成。不过,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央行无法直接决定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它将通过各种间接的手段,如公开市场操作等,影响

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因此,从根本上说,政府干预的目标总是通过对市场定价机制的补充或替代而实现的。

其次,“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一经提出后,政府干预就逐步成为常态,也就是说,一旦经济运行发生波动,政府就可以运用扩张的、稳健的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不同的政策组合进行干预,以期达到相应的政策目标。尽管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发生“滞胀”后,凯恩斯主义遭遇了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强烈挑战,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成为各国政府公共政策的一部分,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成为常态的政府干预。

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后,我们看到,即便在微观经济领域长期恪守市场自由的国家,如美国,也采取了重组企业债务和产权的干预措施,即所谓“国有化”的措施,哪怕这些措施是短期的。相对于常态的政府干预,这些措施就是非常态的政府干预。常态的政府干预和非常态的政府干预是政府干预的一次新综合。人们认为,政府对一些“大到不能倒”或“太关联不能倒”的银行和公司实行“国有化”的救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决定的。那么,严重程度又如何度量呢?这可能本来就是一个相机抉择的问题。我们观察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时,就看到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原则在微观干预中也得到了延续。

再次,以往的政府干预,其对象是商品市场,干预的目的是试图帮助商品市场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恢复均衡。财政政策的干预手段——政府投资和购买、减税、转移支付等——会直接影响商品市场的产出和需求,进而对恢复市场均衡起作用;货币政策的干预是通过货币市场进行的,即通过货币市场的利率或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影响商品市场的产出和需求,以恢复商品市场的均衡。

我们知道,资本市场并不存在商品市场意义上的出清问题,这是因为,资本市场产品的成本与收益受到风险、预期定价失灵的影响,是

无法给出市场是否出清的标准。然而，一旦风险过度、预期过高，就会出现这场金融危机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危机爆发前，在低利率等因素的推动下，美国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和企业，特别是投资银行，资产负债率（即杠杆率）高企，一旦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具体地说，就是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征兆，央行开始提高利率，系统性金融风险形成，高负债率中所隐含的资产估值过高即泡沫顷刻破灭。这是一个由资产市场和资本市场过度需求而引发的，由繁荣迅速向衰退转化，导致商品市场不能出清，即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问题。

目前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由于资本市场是否出清没有一个或多个可供判断的宏观指标，因此，也就无法给出预警的信号，政府宏观经济当局难以作出有针对性的应对。当资本市场一旦出现危机，即泡沫破灭时，社会直接面对的问题，就是资本市场上的大机构因不堪债务重负而面临破产，它们的破产将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政府则面临救也不是、不救也不是的两难选择。而且，金融危机迅速影响实体经济，一方面导致经济体的下滑或衰退，甚至陷入萧条；另一方面，使实体经济中业已存在的总量或结构问题变得更加严峻。此时，政府既要救实体经济，也要救虚拟经济，从而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尽管以往也有因金融问题而引发的经济危机，但无论其规模和性质都与此次有很大不同。因此，以这次金融与经济危机为背景，研究政府对资本市场的有效干预，特别是与商品市场干预综合意义上的干预，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对资本市场的干预行为不同于监管行为，前者侧重从总量上预测和控制系统性风险，后者则从微观上防范和控制非系统性风险。

第四，通常所说的政府干预，在没有特别说明时，都是指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干预。以往，当中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时，欧美的经济学家会批评中国政府的某些调控措施不是宏观调控，而是微观调控，即对微观经济进行政府干预。这场金融危机后，我们看到了美国政府的微

观干预,也就是上面所说的非常态的政府干预。因为哪个国家都会出现非常态,因此,尽管微观经济的政府干预弊端很多,要尽可能少用,但是,完全避免看来是不现实的。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国家来说,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政府运用的行政手段都难免有微观干预之嫌,这些都还有待通过深化改革,才可能逐步解决。

如果说反周期的政府干预是宏观干预的话,那么,相对于市场自由而言的政府干预就是微观干预。准确地说,相对于市场自由而言的政府干预,就是以克服市场失灵为己任的政府干预。这里,政府干预主要是做规制、监管,或者为主体间的博弈和市场运作设计一个机制,从广义上说,这些政府行为也是政府的公共服务。而且,如果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考虑和提供政府对市场失灵的规制、监管,以及设计机制,那么,在常态条件下,所谓微观经济的政府干预也就不存在了。

第五,仅仅限于经济学意义上讨论政府干预,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譬如,一旦经济进入下行通道,特别是当衰退,甚至萧条出现时,政府干预的一个重要考虑,是防止失业加剧、低收入人群生活恶化等社会问题。又如,市场失灵所导致的问题,也有相当的部分是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如负外部性所导致的问题。基于这一现实,经济学在研究政府干预时,借助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如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可能会作出一些具有新综合意义的研究。

经济发展模式：成也政府，败也政府

当我们重新认识市场自由与政府作用时,遇到了一个似乎有着较强解释力的概念或提法,即“中国模式”。在这场金融危机后,“中国模式”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并被赋予丰富的内涵。对于中国来说,未来要在正确的道路上继续推进改革和发展,就必须科学审视“中国模式”的内涵,以及它的现在和将来。